

吉米:报道中国33年(2)

◆ 李伟
张兰英

浪漫与现实

裹挟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与青年运动中,吉米也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。他们走上街头,反对越战、反对独裁、反对腐败。就在那时,他收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,希望他能组织一个15人的青年代表团,来中国学习访问三个星期。“我当时对‘红色中国’一窍不通,只是看过几篇介绍性的文章,翻过几页毛主席语录,听过一两场曾经去过中国的记者的讲座。但我并不懂汉语。在我心中,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。”吉米回忆说。

他很快联络了一批革命青年,组成了15人的访问团,在1971年的8月21日,坐飞机前往香港。去机场之前,吉米还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。在香港休息两天后,他们由深圳入中国内地,然后在广州坐火车到达了北京。

在北京,他们参观了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,访问了北京大学,并与红卫兵代表座谈,还去参观了协和医院,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上百人的国宴招待会。在天津访问了部队,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,与下乡知青聊天,还见到了大寨农民代表郭风莲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耿飚都接见了他们。

“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乌托邦,没有贫富差异,没有犯罪,警察都很少,汽车更没有几辆,官员也骑着自行车上班。在人民公社,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,人人都有饭吃,生活有保障。”吉米说:“我当时很兴奋,没想到,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国家。当时我把中国浪漫化了。带着这种浪漫的感受,我天真地思考着菲律宾能否也走上这条道路。想三个星期后回国,还要大干一番,继续革命。”

然而就在访问的尾声,吉米听说了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。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,一些人失踪了,回国之路命运莫测。吉米陷入了彷徨

犹豫。他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,想着女朋友,还惦念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。最后,他决定先留下来,等待消息,寻找回国的时机。“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。但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,我也会被捕,甚至不知生死。实际上,我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恰当的地方,用英文说是‘Blessing in disguise’(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)。中国是我的避难所。”吉米说。

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,这一等就是12年。他与家人的通信不得不在美国的姐姐中转,一来一回要花三个月的时间。

最初吉米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,政府告诉他,不要着急,耐心等待,食宿都不用他操心。但吉米觉得这不啻于一场苦行。

“我才20岁,想要改变世界,想要革命,根本待不住啊。”他继续上学,去学习汉语,但当时北大等高校刚刚恢复教学,还没有招收外国人。然后,吉米就申请去工作。当时,中国城市年轻人都在农村战天斗地。于是,在1971年底,吉米成为一名“洋知青”,被安排到了湖南衡阳的湘江农场劳动。他白天和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,挖水渠、挑土、采茶,晚上要学习两个小时的中文,陪同的翻译兼任汉语老师。

在湖南工作了一年后,吉米又被安排到了山东烟台渔业公司。每次出海要在海上工作五六天,他负责开船、拉网、捡鱼。“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用汉语和大家交流了,不需要翻译。工作虽不是很辛苦,但我却感到很寂寞。每天晚上下铺后,船停无边无际的大海上,更加想念家乡和亲人。”吉米说,每次出海前,他都会带上一大摞《人民日报》。一方面可以学中文,另一方面,通过媒体研究政治。为



■ 2014年,吉米在为采访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做准备

了学好中文,吉米向朋友借了一本汉英政治词典,厚厚的三大本。他一页一页地抄,足足抄了一大半。看他这么辛苦,朋友最后把这套词典送给了他。

这时的吉米,不再是参观访问团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。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基层现状,他交了许多朋友,因而也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始深入地思考,向浪漫告别。

“那时候,我们聊天都会交流一些‘小道消息’。我已经意识到表面与实际有许多差距。1975年,邓小平复出后又被打倒,但我们都相信邓小平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。我下决心要独立思考,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肤浅到深入,从天真转入现实。”吉米说。

在烟台当了一年半“渔民”后,到了1974年的夏天,他便得知北京语言学院可以招收外国学生,于是他便申请进入学校,正式学中文,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。此时,

吉米已经离开大学四年了。1977年,他通过北京大学的中文考试,进入了历史系读书。当时高考刚刚恢复。他在学校待了半年,和工农兵学员上了一些必修课程。直到1978年春才和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大学生一起,重新走入课堂。

1977至1978年,正是中国的转折时代。年轻人思想开放,关心国家的未来。“课堂内外充满了辩论,争论都是大问题——中国应该向何处去?人民公社要不要改变?‘文革’的错误在哪里?如何评价毛泽东?一分为二还是三七开?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们。”

北大的四年生活,是吉米在中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他和中国的精英们在一起度过。

“77、78届的学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,他们很多人曾经下乡,或在工厂、部队工作过,社会经验丰富,了解国家现实情况,又保持了良好的学习能力。他们年轻,有理想,真正想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。”吉米说。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,他将“一二·九运动”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,他还亲自采访了十几位历史的参与者。

就在1983年,吉米的父母从菲律宾转道美国来北京看望他。这是一家人分别12年后再度相见。父母带了一个大大的旅行箱,给他带了一双鞋、一条皮带、一件茄克和洗澡用的香皂。“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可怜吧。”吉米说。这时吉米看起来和中国年轻人没什么差别了,穿着中山装,理着很短的发型。姐姐和父母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,所以希望他也去美国。但吉米还是决定留下来,因为他已经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。

花儿为谁红

彭瑾



8.病人摔坏手表

第二天,凌诗然询问情况,没等护士说完话,一个高个子男人冲进来,气势汹汹地说:“你是科主任吧,我老婆昨晚把手表摔了,8万元的手表啊,你们要赔偿的,不赔我要告你们。”

凌诗然懵了,她既不能发火,也不能不管。凌诗然在交班会上说:“今天30床王军的家属说病人昨天摔坏了8万元的手表,病人的暴躁跟我们有关,要求赔偿8万元。30床是我的病人,请昨天的值班医生说说30床的情况。”

值班医生说:“昨天晚上来了一个跳楼病人,韦教授,哦,韦主任是值班上级医生,我打电话给韦主任。韦主任一看病人,说必须手术抢救,否则病人不仅造成瘫痪,还会有生命危险。在忙活这个手术病人时,30床王军不停地,自己颈椎有毛病,总说难受,我给她检查过,跟入院时一样,没有特殊异常情况。”医务人员静静听着。

“30床转院来,在外院经过三次手术,手术效果不好,才来我院。入院第二天来了月经,不能手术,到今天第四天。我们在给急救病人准备手术时,30床王军还在走廊里溜达,情绪平稳。可能医生都去手术了,护士顾不上给她心理安慰吧。等我们手术回来,已经是今天早上,听夜班护士说,她把8万元的手表摔了。”有人插话:“她摔手表跟我们医生有什么关系啊,我想,跟护士也没有关系吧。”有人窃窃私语。

凌诗然对昨夜值班的护士说:“小李请你说说昨天晚上的情况。”护士小李怯怯地站起来,她说:“昨晚韦主任带他们医生上手术台了,我一个人在护士站写记录,填手术病人的表格。病人王军好像睡不醒,闲着没事,在病房里溜达。我问她怎么不睡,她说睡不着,还想塞给我两个好大的咸鸭蛋,我没要。她问我抢救病人啊,我说是的,病人是个女的,跳楼了,说完我铺床,准备后续工作。”她努力回忆着。

“对了,约后半夜,她总说脖子难受,我看过她两次,真没事,但发现她情绪不对,表现

出烦躁和不安。我也安慰她了,说没事儿。清晨快五点,医生们回来了,她要求打镇痛针,医生不同意。或许,这个时刻,为了抢救的这个病人,我们忙里忙外,顾不上她。她把手表摔了。”

凌诗然问:“这个病人摔东西你们知道吗?”护士小李答:“她摔东西时,把病房的人都吵醒了,是31床叫我们过去的。韦主任当时说,给病人吃了一片维生素C,我亲自喂她的,说是镇痛药比较管用。吃了,很快病人安静下来,说明她精神因素很大。”

说到这里,韦铁锋把话接过来,他说:“这个病人心理有问题,她曾经也是由于失恋跳楼,没有死成,手术没有治好。经过两年的进院、出院、再进院,她的心理跟正常人有很大差距。昨天给她吃了一片维生素C片,安慰一下她,她立刻安静下来,说明她颈部没有像她说的很难受。也许是小李告诉她病人是跳楼的,刺激了她,再加上当时比较忙乱,冷落了她,表现出的一种发泄,我是这样认为的。”

凌诗然说:“现在病人情况平稳,可家属来闹,说她摔掉的手表是8万元,跟医院有直接关系。要求赔偿,这样吧,情况我了解清楚了,这个事情出面跟家属谈。”大家沉默无语。

凌诗然凑够8万元现金放在桌上,把家属找来。王军的老公沉默无言,他瞅了一擦钱,又看凌诗然一眼,低下头说:“凌主任,听我说几句吧,说真的,我们这些病人和病人家属也不是不懂道理的人,更不是无赖,来讹医生钱的。我呢,来找我,说话态度生硬,是我不对,我也不是存心来闹,只是着急。”他沉吟不语,内心隐隐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,不想为难医生,不做那种有伤风化,留下恶名的事情。

他继续说:“你不知道,我和王军感情一直不好,她有一个男朋友,感情一直没有断,发生得蹊蹊跷跷,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,您应该理解。我虽说照顾她很少,但我有责任,一天来一次医院,其他时间由保姆照顾,这样挺好。”他再一次低下头。

凌诗然说:“你们是亲人,凡事得从病人着想。”他沉思一下说:“我知道她心里痛苦,可我也做不到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,请凌主任多加照顾。”他突然想走。凌诗然起身准备送客。

21.竟然落到这种地步

两年后的1942年冬。外滩,黄浦江边货运码头。天上飘着雪花,远处飘来悠悠的小提琴乐曲。浑厚的号子声中,已恢复健康的唐金汉在搬运工人中扛着大包,突然,在走下甲板时一脚踏空,背上的货包掉了下来,他忙去重新扛起,工头的鞭子已举在他的头上,他猛回头怒目而视,却突然愣住了。与此同时,工头手中的鞭子落地:“大少爷!”跪在他的面前,原来眼前的工头竟是他的司机老王,王德魁。

外滩旁三马路口小酒馆,唐金汉和老王面对面而坐,桌上摆着花生米、猪头肉对饮。老王呷了一口酒:“嗨,是什么世道啊!堂堂上海滩上的小开,留洋欧洲的大学生,竟落到这种地步呀!”

唐金汉:“扛大包好啊,虽然苦点、活重点,但比那些汉奸、奴才的钱干净!”猛喝一口酒:“哎,老王,你怎么会?”老王:“一言难尽哪……自从离开你府上后,我拉过黄包车、蹬过三轮、跑过单帮,为了一家老小糊口吃饭,我什么都做过。上个礼拜,一位堂房兄弟帮我我在码头上找到这个当工头的差事,今天天一上班,就碰上大少爷您。老爷、老太太、太太和大小姐都好?去年我去卡道里的大理石宫殿去看你们,看门的说你们已不住那里了。”

唐金汉:“不能老麻烦人家嘛。不过,家父已在去年底过世了。”老王:“啊!眼看自己创下的家业,让小鬼子抢去,老爷是死不瞑目呀!”黄浦江边传来那熟悉的小提琴声。唐金汉举杯眺望过去,只见江边自由女神像下,一位戴着凯帽和墨镜的男人正面对码头感情投入地拉琴,一些行人驻足聆听,有些人向他脚下的包里丢钱。

老王:“少爷,少爷……”见唐金汉全神贯注地倾听对面那人在拉琴:“您在听那个外国瞎子拉琴?”唐金汉:“那不是瞎子,是露茜娅。”老王:“露……您说的是那位犹太小姐?”唐金汉点头:“这两年,为了不惹麻烦,每天这个时候她就女扮男装装瞎子到这里来拉琴卖艺,她的琴声,给了我度过这段最艰苦岁月的勇气,她在纱厂上夜班,下班来这里拉琴,还

把挣到的钱让诗菲带回家交给妈妈,贴补家用。”老王:“真是难得有这样的外国女子。走,少爷,去看看她!”唐金汉:“不!别去打扰她。”老王:“怎么?你们……”唐金汉:“彼此心里装着对方,何必说见面?”老王:“嗨,你们这种苦恋,好像说书、唱戏似的。没想到眼下就在少爷你身上见到。”他猛喝了一口酒:“少爷,也许我不该问,少奶奶好吗?她的病……”

伊文斯诊所。刘舒婷穿上白色护士服显得健康、精神。她在病房内一会为病人打针,一会为病人送药、量血压忙个不停。

黄包车夫张新民过来:“护士小姐,你……刘舒婷女士?您的病全好啦?而且成了能干的护士小姐……”刘舒婷:“多亏伊文斯博士把我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,又帮我精心疗养。我原来学过几天护士,就留下来帮助做些护理工作。”随即,拉他到无人处,小声地说:“伊文斯博士说,你们要的一批药品,他已经搞到了,等你赶快运出去。”张新民:“好,我还有事要找我。”刘舒婷:“不巧,他到虹口犹太难民营出诊去了。”张新民:“请转告他:我们游击队昨晚和鬼子的交火中,一位长官负重伤,最近鬼子查得很紧,不便来上海治疗,最好请他过去一趟为他诊治。”说完匆匆离去。

江边,自由女神塑像下。扮作男盲人的露茜娅又在拉琴卖艺。一曲《印第安人的悲哀》琴声低沉、哀怨……不远处,刚下班的唐金汉驻足在人群中聆听。一位颇有艺术家风度的中年夫妇走来,也在围观者外站定静听,少顷,他送上两块银元和一张名片。名片上写着:“有便请来敝校一晤——沪江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赵音。”

不远处,外滩公园内。米切尔和唐诗菲坐在公园长椅子上互教中、德文。米切尔充满感情地背诵着中国的唐诗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背到此时,一股热泪盈眶而出。唐诗菲:“米切尔,你哭啦?”米切尔擦泪,凝视着滔滔的江水:“明月、故乡,这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的最起码的权利。但我的故乡在哪里?”

犹太难民在上海

（影视小说）

耿可贵

